

#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辨识方法与保护策略

## ——基于荆襄地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研究

许广通 何依 王振宇<sup>1</sup>

**【摘要】**历史城区的结构原型，蕴含着城市空间变迁的来龙去脉，它是我国历史城市特有的“形态基因”，也是解读城市历史文脉的“空间密码”和协调历史保护与现代建设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前城市历史环境的现实问题与保护困境，结合荆襄地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研究，引入原型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三层内涵及其图式转换逻辑——概念原型、存在原型与意象原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辨识方法，并面向更新发展探索原型维度的保护性建构策略，以期体现历史的规定性、演化的规律性及发展的适应性，为应对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困境提供解决方案。

**【关键词】**历史城区 结构原型 保护性建构 荆襄地区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63(2021)01-0111-08

“历史城区”这一特定的城市空间单元，一方面，作为古代城池环境的当下遗存状态与现代城市空间的拓展原点，其结构蕴含着城市空间变迁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下的重要保护层次与范围，是各“名城”价值特色的完整性体现（何依，2018）。然而，在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名城”的刚性申报条件与保护底线之后，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逐步让位于城市开发（林林，2016），有区无城、有格局无实存的碎片化、模糊化问题已成为普遍现象。新时期，在对“名城”制度实践的总结与反思之际，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再次得到关注（邓巍，2016）；与此同时，伴随“城市双修”等治理举措不断深入推进，保护工作也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所以，亟须在新旧交织的遗产环境中重新认识历史城区的整体特色，跳出“新-旧”二元认识论，在零落的历史空间中探索古今关系、新旧关系与整体关系等复杂问题的统一逻辑。

城市空间，尤其是历史城市，有着惯常的组织逻辑与形态规律，可以从中抽象出相应的空间原型（杨俊宴，2016）。历史城市结构体系的原型分析，是城市尺度遗产保护的核心议题，而“原型”维度的二元统一与新旧关联，也是当下值得深入探索的一条保护路径（常青，2017）。何依教授团队提出了“四维城市”的理论与方法，针对历史城区的“原型——转译”展开了相关案例研究（许广通，2018）。荆襄地区曾作为营城要地<sup>①</sup>，城池形态与遗存类型丰富，针对上述复杂问题与现实困境，本文将结合该地区名城保护研究，从更为广阔的区域视野，进一步探讨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概念内涵与辨识方法，进而提出一种原型维度的保护性建构策略，以期为我国历史城区整体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 1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概念内涵与图式转换

历史城市与民居院落结构层面呈现出典型的“同构”特征（朱文一，2011），同时，城市与建筑通过“共时与历时”的时空逻辑进行关联互补（沈克林，2010）。而在建筑类型学范畴中，原型分析已为建筑类形态与类设计的研究构筑起完整的理论框架，对历史与地域特色的建构提供了系统的逻辑方法（汪丽君，2019）；但原型分析之于历史城市的形态研究与历史城区的建构

<sup>1</sup>**作者简介：**许广通，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1160396570@qq.com  
何依，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博导，通讯作者，heyihust@163.com  
王振宇，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宁绍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保护研究”（项目编号：52078228）

意义，几乎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下文便对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内涵特征与意义作用进行具体探讨。

### 1.1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概念内涵

“原型（prototype）”从其字面含义理解是原初的“型”式，早期指心理学领域中“集体无意识”的经验结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张琳惠，2016），受此影响，罗西认为在复杂的建筑形式与演变中，潜藏着某种经久的、深层的“类似性”结构概念，它是一种超越形式的内在秩序，即建筑原型（阿尔多·罗西，2006），进而，可以得出建筑原型具有时间价值与结构意义多重作用，并可通过其控制要素的实形与虚像来认识其图式关系与整体特征（刘磊，2017）。

因此，从“原型”的概念出发，做进一步引申，可以将历史城区的结构原型界定为：城市历史中特定空间要素的组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且稳定的秩序法则，是支配城市空间演化的内在逻辑，其空间图式长期积淀为某种固定的意象，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而受制于营城制度的统一规约，由历史中心、轴街、边界与标志物等空间要素关联组合且相互制约形成的结构体系，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历史城市当中，成为今天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整体图式”。这种图式既有普遍的统一性又有地缘上差异性；既非城池空间的初始状态，也非绝对的静止状态，它形成于人们长时段的建构过程，稳定于城池空间的“完型”状态，并会伴随城市重大事件进行适应性修正，具有历史层积载体与空间整合媒介的双重作用。

### 1.2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图式转换

历史城区通常为古代城池空间在现代城市环境中的遗存状态，在这过程中，从历史形态到现今状态、从国家制度到地方实践、从历史城区到现代建成环境等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也通过结构原型的经久性与控制性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抽象概念、存在形式与集体意象 3 个维度和先验性制度传导、后验性地方建构与选择性认知还原 3 个阶段。

#### 1.2.1 “概念原型”——古代城池的空间范式

中国古代城池早在起源之初，便作为权力运作的中心场所。随后，在《周礼·考工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制度化的营城范式，其构图法则被抽象为“内城居中、经纬轴街、边界围合、标志物彼此呼应……”。而相互勾连的“整体化”防御系统、合乎礼制的“等级化”营城思想、遵循模数的“程式化”营造制度，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范式的操作系统。这也标志着历史城区结构“概念原型”的图式形成，作为一种“先验”制度、形式规则与抽象模式，长期规定着历史城市的空间规模、要素配置、秩序关系与演化变迁，是今天从整体层面认识历史城区形态特色的基础文本与共性考察（表 1）。

#### 1.2.2 “存在原型”——地方城池的层积秩序

在“概念原型”统一的制度化传导下，各城池空间的营建则是一个地方建构的过程，形成现实意义中的城池空间，作为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凝练，原型的抽象图式被赋予了特定的时空属性，经历了从“概念原型”到“存在原型”的图式转换（乔治·贝克莱，2010），“中心、边界、轴街与标志物”的图式构成，也有了对应的实体指向、时空方位与现实关系等属性。可以说，“存在原型”是在各地方城池的空间化与结构化过程中得以“完型”，并成为城池空间演替的一种整体性层积秩序，并蕴含了每一座历史城区的地域性与历史性差异，特色由此而来。而在具体的“完型”过程中，则主要受概念原型、地理景观与区域结构 3 个主导因素相互作用：首先，概念原型作为一种初始原力，其影响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纵向传导和先验式表达，是一种普遍的共性规约；尽管地域不同、朝代有别、等级有差，由中心、轴街、边界与标志物共同构成的图式关系却无本质区别；其次，地理景观作为一种内部控力，其影响体是长期的、层积的与相互的，山形地貌、江河流势成为相地合宜、因势赋形的自然骨架，进而转化为各具特色的图式形态并内化为城市的文化内涵；最后，区域结构是一种外部向力，其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横向传递与阶段性融合，影响着城市的特色职能与关联耦合的功能布局。这 3 大主导因素也是整体把握“存在原型”图式特征与文化意义的重要线索（表 1）。

表 1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比较及转换关系分析

原型图式	概念原型	存在原型	意象原型
图式内涵	古代城池的空间范式	地方城池的层积秩序	城池空间的集体记忆
认知维度	观念性构图法则	现实性空间凝练	选择性印象关联
转换关系	先验性制度传导	后验性地方建构	失序性认知还原
影响因素	“整体化”防御体系 “等级化”营城思想 “程式化”营造制度	初始原力:概念原型 内部控制力:地理景观 外部向力:区域结构	历史空间的碎片化遗存 场景环境的选择性认知 场所要素的选择性记忆
形态作用	制度化与要素配置	结构化与空间格局	再结构化与空间意境
图式意义	国家与地方的连接媒介 制度与实践的统一载体	整体与部分的整合媒介 历史与当下的统一载体	实形与虚像的共生媒介 空间与行为的统一载体
统一逻辑	“历史中心、边界、轴街、标志物”相互关联且 彼此制约的组合关系及内在秩序		

### 1.2.3 “意象原型”——城池空间的集体记忆

以近代社会变革为重要拐点，城市人口集聚与生产规模扩张、建城模式与营造体系突变以及交通变革与区域结构重组，分别改变了历史城市的职住方式、建设方式与交通方式，城池形态在内外多重动因的共同推动下，逐渐解体甚至嬗变，而变迁结果即历史城区的当下状态。在当下新旧交织的历史环境中，“存在原型”所对应的实体空间也由显性转为隐性、由整体转为碎片，但因为集体记忆的缘故，生活在历史城区范围内的“此地人”，即使面对失序后的城池空间，依然能通过认知“还原”出一个整体的原型图式，换言之，历史城区的原型图式再一次由“存在原型”转换为“意象原型”。而“意象原型”是人们对现实空间认知的一种整体图景，也是对场景环境选择记忆形成的一种关联印象，揭示了物质空间与心理感知的内在联系规律，是识别历史城区整体形态特色的虚像把握，具有结构性与场所性双重意义（表 1）。

## 2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辨识方法及建构意义

在旧城改造与新城扩张并重的现代建设中，历史城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新旧要素交织、内外环境融合、古今文脉割裂等问题。但“结构原型”作为一种内在的整体秩序，在历史城区空间演变过程中始终具有“在场性”，并长期起着整合与约束作用，从而在当下城市环境中，研究历史城区的空间特色与保护，就不能回避原型的辨识问题。荆襄地区曾作为营城要地，形成了一批以荆州、襄阳与荆门为代表的军防重镇及有机联系的区域功能结构，城池空间各具特色、遗存类型丰富多样，下面便以其为典型，探索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具体辨识方法。

### 2.1 区域社会中荆襄地区的城池秩序

特定城池空间是传统营城体系与区域社会环境长期互动的建构结果，有着内外一体的关联秩序与多元互构的系统特色，蕴涵着概念原型规约下的普遍性与地方特色的差异性。而区域社会中相互关系所反映的“空间结构”，也是一个长期、复杂与互动历史进程的结果与缩影（赵世瑜，2006），为把握地方性城池秩序提供了史地维度与关联逻辑。

荆襄地区历史上地缘相接、功能交织、文化同源。地处大洪山与荆山山脉之间的南北通廊，汉水纵贯其中，地理景观也呈现明显的段落分异；同时，荆襄古道水陆并行，连接荆州、荆门与襄阳，为古代北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催生了区域发达的流通网络与商驿节点（杨正泰，1994）；独特的地理环境、发达交通网络与广阔的经济腹地，奠定了荆襄地区的战略地位，也形

成了层层设防、相互协作的联防体系（刘炜，等，2018），成为辨识该地区城池秩序3条重要线索。

首先是区域自然地理景观。作为城池空间“缘地”生长的底层逻辑与地方文化的层积脉络，它是把握城池秩序的基本原点。其中，北侧襄阳城位于南襄盆地边缘处汉江河湾“水口”，形成了古城“倚山扼江、九水润城”的外部自然格局；中部荆门城位于荆山余脉处丘陵岗地“关口”，奠定了古城“两山夹川、双水绕城”的空间骨架；而宜城则位于荆襄接壤处的“水口与关口”，塑造了“两山对峙当孔道，二水交环若天堑”的水陆要冲环境；南侧荆州城则位于江汉平原西侧云梦“泽地”，造就了古城“一河环城、多湖贯城”的地景特色（王树声，2015）；进而原型的控制要素随形就势，揭示着场地的特色与构成了人文景观，并在空间方位与四时更替中，积淀为城市文脉与地方秩序。

其次是地方政治军防环境。治所建制与防御需求是安排城池空间格局与防御体系的重要前提，在封建王朝统治背景下，是权力决定了城池的营建，特定的要素构成了制度空间体系（鲁西奇，2009）。

荆州与襄阳，长期作为府城建制，城池的修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凭借江险，城池高且深，府县同治也使得治署、文庙、学宫等礼制建筑为两级配置，并在城内形成多层次中心，规整的十字轴街统领全城，但荆州曾有东西双城合一的历史，襄阳因汉水改道，二城在形状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荆门与宜城则长期为州县建制，分别有着荆北门户与襄南重镇的卫城职能，城池规模相对较小，治所屡迁而后定，位于主街交汇处，礼制建筑配置较低且布局自由；此外，除了城垣边界，还有荆州的“三海八柜”、襄阳的“十二连城”以及荆门的“三方设关”等拓展各自战略纵深而形成与城池密切关联的军事攻防体系（万谦，2010；张卫，胡根根，2019）。

第三是商贸流通格局。荆襄古道作为一种区域因素，催生了城市商贸繁荣与流通格局，并形成内外衔接的功能网络。荆州与襄阳，作为古道两端水陆换乘中枢，由于防御与商贸需求，均为城、市分立相依的“双城”布局，并在城外围绕驿站与道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关老街，如荆州的北关街市、西关水市、南关堤市与东关草市；荆门与宜城作为古道中间节点，则呈现为古道穿城而过，形成了驿站、关街、内外集市与店铺在古道流通格局中相互勾连的“市轴”特色。

可以说，自然山水格局、制度空间格局与商贸流通格局互构形成历史要素的层积秩序，使得荆襄地区城池空间具有明显的“多构性”图式特征。据此，可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对历史要素进行分类重组与关联解读，认识其内在秩序与控制作用（图1）。

## 2.2 古今转译中三城要素的演替规律

从更大区域视野认识城池秩序，即在当前碎片化历史环境中建立了要素与整体结构的联系；进一步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分析城池空间要素的演替规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关联，并于一个有序的演替过程，认识原型构成要素的控制作用。

时过境迁，荆襄地区城市历史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荆州与襄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遗存条件相对较好，荆门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尚有一定遗存，而宜城已几乎没有物质遗存，故本文将重点探讨荆州、襄阳与荆门三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要素演替。结合田野考察，对地方志、历史地图、居民口述史等文本信息进行相互印证，将这零散、概略或抽象的空间文本信息置入统一的现代地形坐标中进行对比分析，从要素类别来看：治署等行政类建筑伴随着政权更迭，多已发生明显更替，存在一定的功能性联系却较难辨识；荆州与襄阳的城墙与护城河分别因河湖水系与汉水等地景维系而保存较好，荆门则因日机多次轰炸，城墙基本损毁仅剩南侧两座城门，护城河成为城市内河；三座城池的轴街虽维持着历史走向却都有所拓宽，而荆州与荆门尚存有各具特色的城关老街；文庙与书院等文教建筑，普遍扩建为中小学，并以局部建筑或格局形式融入现代校园环境；宗教类建筑保留数量较多且质量较好；阁、塔也多得以保存并成为公园节点。从分布特征来看：实体要素遗存多分布于城外或环城地带，城内则寥寥无几。进一步从演替过程来看，一般有着类似荆门州治“隋代行宫——唐朝凤凰台——明清州署——现代公安局”的功能联系性与时段特征。整体上，荆州表现为“边界+标志物”主导的遗存特征；襄阳与荆门分别为“边界+中心”与“轴街+标志物”主导的遗存特征。

总而言之，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原型的控制要素有着相似的古今转译规律与辨识意义，中心对城池空间有着占领和定位作用；作为历史边界的城墙与护城河，则有着围合与叠加特征，标识了城池的范围；历史轴街，具有坐标轴式的拓展与延伸作用，即使对现代城市空间拓展也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文庙、钟鼓楼、寺塔等历史标志体系，同样发挥着锚固与引导作用，并延续着一定的场所特征，成为研究历史空间辨识与变迁的重要参考（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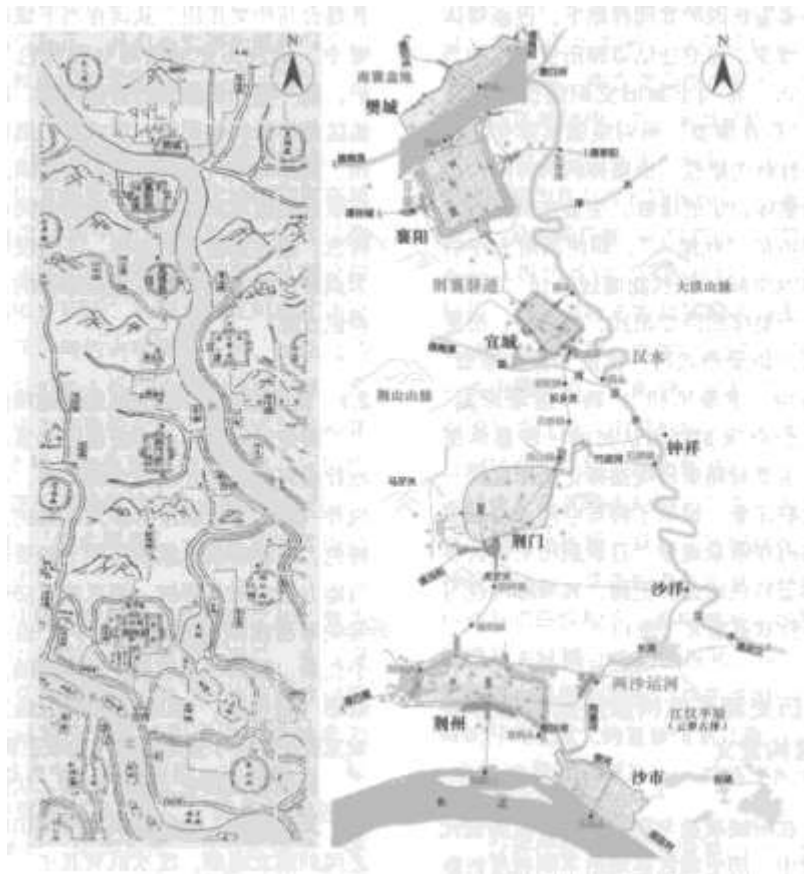


图1 荆襄地区历史城池的整体秩序及区域关系示意

资料来源：左图《湖北省历代地图成果概览》编纂委员会，2017；右图作者自绘

表2 荆襄名城结构要素的演替规律和辨识意义

结构原型的控制要素			转译结果		
要素类别	辨识意义与演替方式	要素名称	荆州古城	襄阳古城	荆门古城
历史中心	中心的占领与定位（功能延续）	治署（府）	军分区	市委党校	—
		治署（州/县）	区政府	监狱家属院	市公安局
历史轴街	轴街的拓展与延伸（格局延续）	南门正街	御路正街+冠带巷	南街（路）	工商街+府前街
		北门正街	三义街	北街（路）	北门路
		东门正街	张居正街	东街（路）	中天街

		西门正街	荆西路	西街(路)	中天街
		十字街	大十字路口	路口+市场	十字路口
历史边界	边界的围合与叠加 (整体延续/要素更替)	城墙	完整城墙	基本完整城墙	局部道路+替换建筑
		护城河	护城河	护城河	竹皮河+浏河
历史标志物	标志物的锚固与引导(场所延续/要素更替)	钟鼓楼	钟鼓楼市场	昭明台	—
		文庙	实验中学	襄阳五中	红旗小学
		城隍庙	区武装部队	荣安大厦	荆州宾馆
		关帝庙	关帝庙	医院	实验小学
		书院	龙山书院/中学	鹿门书院/家属院	象山书院/中学
		寺、观	荆州三观	铁佛寺	白云楼
		阁、塔	明月楼/公园	观音阁/复建	文峰、升天塔/公园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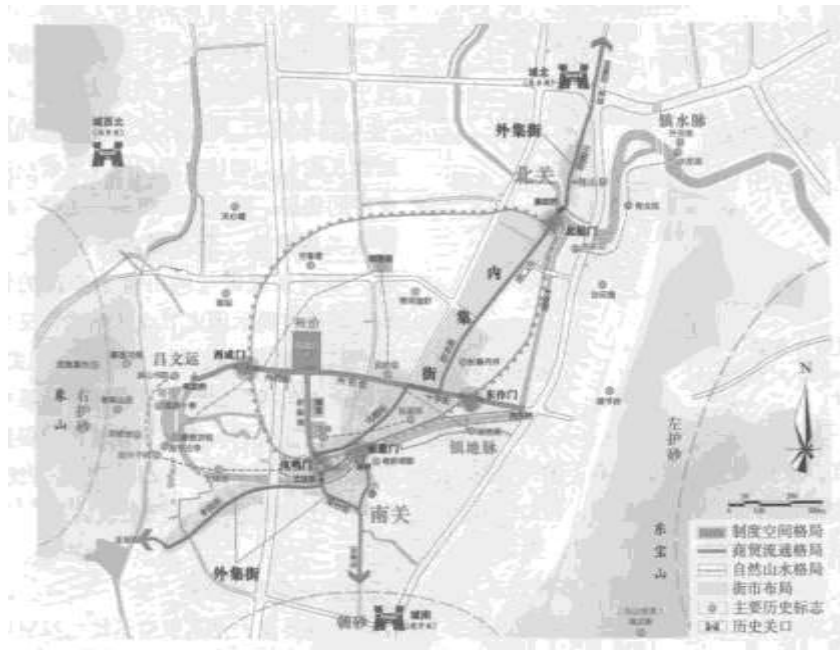


图2 荆门古城整体秩序关系的图式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2.3 集体记忆中荆门古城的意象特征

居民对空间的集体记忆，叠合了个体经历与集体意识、历史形态与现实场景、实物存在与民俗文化等多重维度的内容形成

稳定认知图景(金云峰, 项淑萍, 2012), 是认识“意象原型”的重要参考。不同于城池秩序的整体关系与要素演替的古今关系, “意象原型”对在支离破碎的历史环境中把握空间的“意形”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可通过访谈、问卷、网络词频统计以及图像辨识等多种手段相结合, 研究居民对古城历史资源的整体感知, 解析历史城区的遗存状态与整体意象关联。

荆门作为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空间要素更替明显, 代表了当下历史城区的普遍现状, 探析其要素的集体认知与意象特征极具典型意义。在历史城区范围内, 基于 120 份有效调查样本进行分析, 辅以旅游网站相关词频分析, 可以发现: 整体上, 实存资源的认知度明显高于已消失的要素; 同时, 人们对各历史要素的认知情况, 不仅包含了个人与物质要素互动体悟形成的空间记忆, 也涵括了个体情感、公共生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等多重因素。如古城西侧象山与书院保存至今, 成为城市文化的象征; 北关厢民主街, 作为荆襄古道的历史缩影并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是古城居民重要的心灵坐标; 南侧两座城门作为仅剩的城墙实存与日机毁城的见证, 其故事被代代相传并不断被记忆……总之, 不同于过去显性的整体空间秩序(图 2), “南门、北厢、西院、东河与中街”在相互联系的集体记忆中, 从意象层面建构起当下古城的整体认知结构与关联图式(图 3, 图 4)。

总而言之, 历史城区的结构原型作为一种深层的、稳定的秩序, 蕴含着城市空间演化的“来龙去脉”, 它是我国历史城市特有的“形态基因”, 也是解读历史城区价值特色的“空间密码”, 以及适应发展规律进行历史城区整体重构的“规划逻辑”。可以说, 在原型的时空维度, 整体中蕴含着差异, 真实中也蕴含着变化——个体要素的演替整合了整体结构的形态关系, 后续要素的产生也携带了既往空间的形式特征, 作为变化当中稳定的形式关系, 对城市历史空间的保护, 有着重要的规定性作用与建构性意义。

### 3 原型维度的历史城区保护性建构策略

传统基于优质遗存的“防御式”管控方式, 抢救了一批价值特色较高的遗产资源点, 但已难以适应或扭转当前城市历史空间零散化趋势; 困在“模式”中的街区保护与利用方式, 也进一步造成了历史环境日趋同质化。而基于历史城区的结构原型, 可在古与今、内与外、整体与部分、保护与发展等多重“二元”复杂问题间建立起逻辑关联。因此, 在“建构”与“再结构化”逐渐成为遗产保护议题的背景下, 依据原型的建构性意义, 突破被动式保护思维的局限性, 探讨一种原型维度的保护性建构策略, 具体从层积结构、空间要素与关联意象 3 个层面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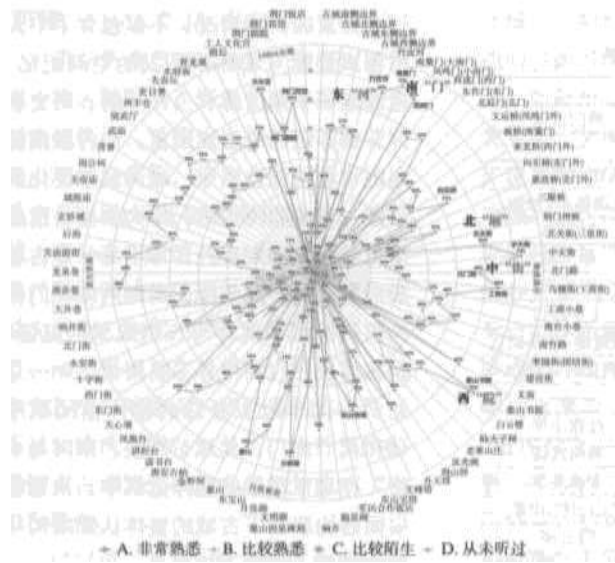


图 3 荆门历史城区内居民对历史要素认知的调查分析

资料来源：许广通，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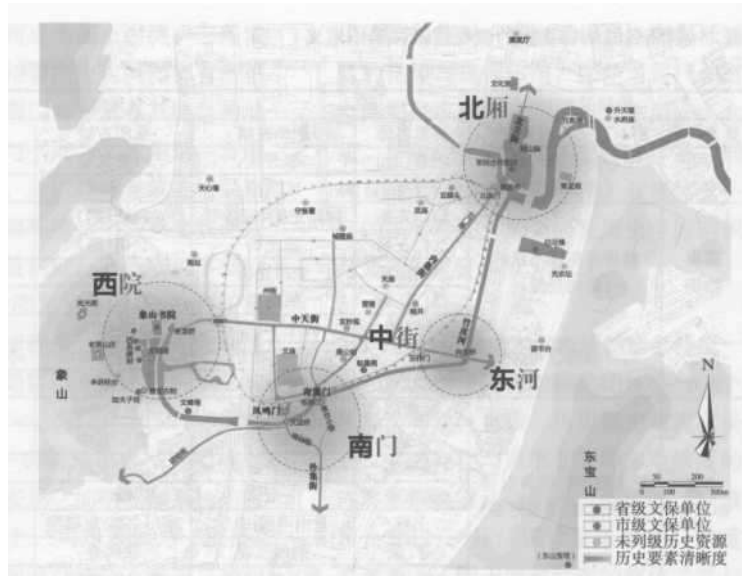


图4 荆门历史城区“意象原型”的图式关联特征

资料来源：基于“许广通，2018”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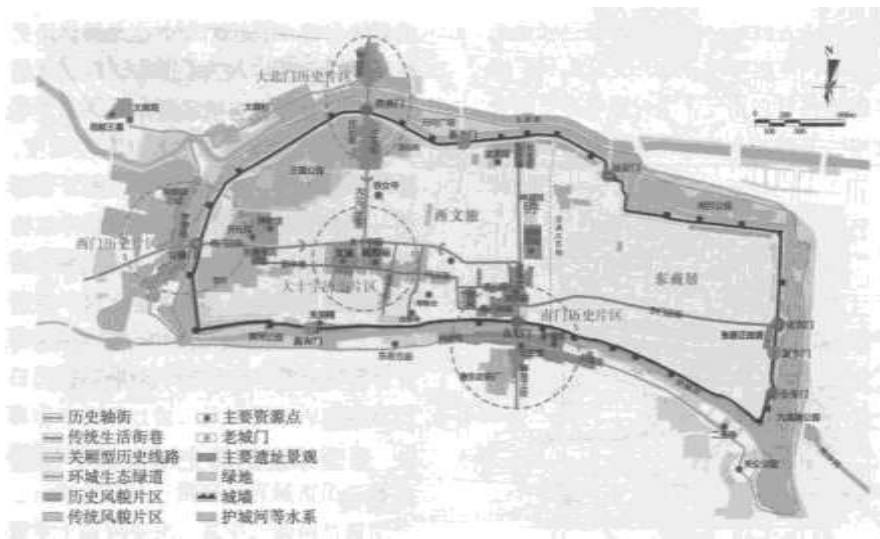


图5 荆州历史城区结构关联整合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3.1 历史结构叠痕构“序”

历史城区结构原型的稳定秩序长期支配着空间要素的演化与更替，使得今天城市历史环境多表现为历史结构与老旧建筑相结合的“表里”关系，其整体关系在新旧交织的现代环境中依然有迹可循。未来历史结构的保护，也要遵循这种痕迹，通过关

联建构等手段强化日渐消隐模糊的位序关系与组构逻辑，弥合新旧空间的历史断裂感，使得城市历史与文化在系统的空间叙事中得以体验。

根据荆襄地区历史文化名城的遗存特点，依托历史边界、中心、轴街与标志物等结构要素的构图法则，通过遗址公园、历史之径、场所重塑、界面整治、景观艺术、适度复建等多种方式，在原型的规定下探索适应性关联整合策略，进而重构历史要素的整体意义框架。如在荆州，提出“边界——中心”拟合式关联策略，在现有城墙与三片城关老街保护的基础上，沿着各城门正街，有序向城内推进，并在线路交汇的大十字街处，通过文庙、武庙等景观节点的塑造，形成“三关聚十字”的历史保护框，进而构建西文旅、东商居的差异化发展导向（图 5）；针对襄阳，在已修复的中心昭明台与环城绿带的基础上，提出“中心——边界”嵌套式关联策略，结合“背街小巷”等老城微改造项目，根据传统街巷的特点，提升一系列活力主街与静宜小巷，分别形成嵌套在中心与边界之间的“历史体验环”与“生活体验环”，提升古城文化体验的连续性（图 6）；而针对荆门遗存要素空间失序的表征，提出“轴街——边界”串接式关联策略，通过城内历史文化步道、沿河景观带与两山登上步道的结合，选择性揭示历史节点的组构特征与历史线路的序列关系，使得南北两关、东西两山与各零散资源点在相互联系中得以保护（图 7）。最后，在整体的保护框架下，通过合理的标识与讲述系统，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

### 3.2 历史要素类推赋“形”

历史要素，尤其原型图式的控制要素，对历史城区的“完型”认知具有重要意义；而实体要素的大量消失，却在不断加深历史认知的“断裂感”。新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态度也由过去的简单“弘扬”变为“转化”“创新”与“发展”（常青，2018），针对历史城区的现实特征，在原型的图式框架下，尊重要素的演替规律，通过现代形式语言在历史信息场对要素进行类推与赋形，不失为补缺遗产本体与接续古今关系的有效途径。

以荆州西关繁荣街为例，曾为荆南驿所在地与古道绕城而过的组成部分，其空间格局与序列关系延续至今，是水陆商都的历史缩影与名城价值的重要载体。但在近期棚户改造中，一批民居建筑因其价值缺乏充分认识而被拆除，从而破坏了古城风貌与老街格局。鉴于此，保护工作充分梳理了街区历史格局、肌理单元特征及其组合方式，进而提取建筑的形态基因与文化符号，对历史要素进行推衍变体与形式创新设计，进而在未来的更新改造中，倡导“单元式”分类更新策略，尊重整体的格局与秩序同时，将建筑的保护、修复性重建与创新实践都控制历史单元之内，最终，实现街区新旧要素的统一、地方特色保留以及多时段记忆的延续（图 8）。

### 3.3 历史意象聚合造“境”

历史意象的关联图式体现了意象原型的整体特征，揭示了历史城区的整体意义与场所意境，在一定意义上，意象也是历史空间绵延不断的内涵与真实性的根本维系。面对日渐零落的城市历史环境，依托意象原型的聚合意义，将街区修复与地块修补相结合以营造历史意境，使得历史环境的虚像与实像在相互映衬中能识、可读、可体验，进而在原型维度达到统一。

根据上文荆门古城意象特征辨识结果，将历史资源、关联资源与联系空间相整合，将历史片区与潜在改造型机会地块相结合，在南门片区，凸显“城门”的符号特征，恢复两座城门之间与城门内外的整体组构关系，营造城门遗址景观展示区；在北厢片区，保护北关街的市井生活气息的同时，强化古道驿站的序列关系，同时关联周边寺观与生态等资源，形成关厢文化体验区；在西院片区，保护象山书院等标志性建筑，并关联周边象山、陆夫子祠等自然人文景观，形成象山文化展示区；在东河片区，保护城界标识，并结合东城门遗址与周边闲置型空地，形成滨河门户魅力景观片区；针对中街，在保护街巷尺度与走向的同时，通过“段-点”结合的方式修复标志建筑与节点，强化历史轴线的标识，最终建构起一座“城”的意象关联（图 9）。



图6 襄阳历史城区结构关联整合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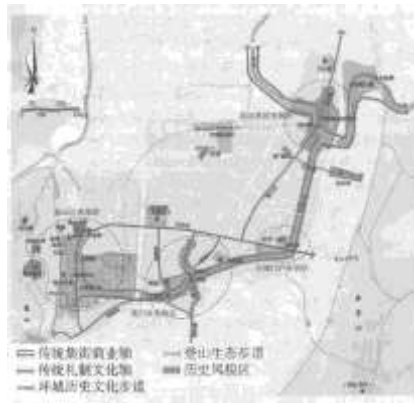


图7 荆门历史城区结构关联整合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8 荆州西关繁荣街的元素类推赋“形”图示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整理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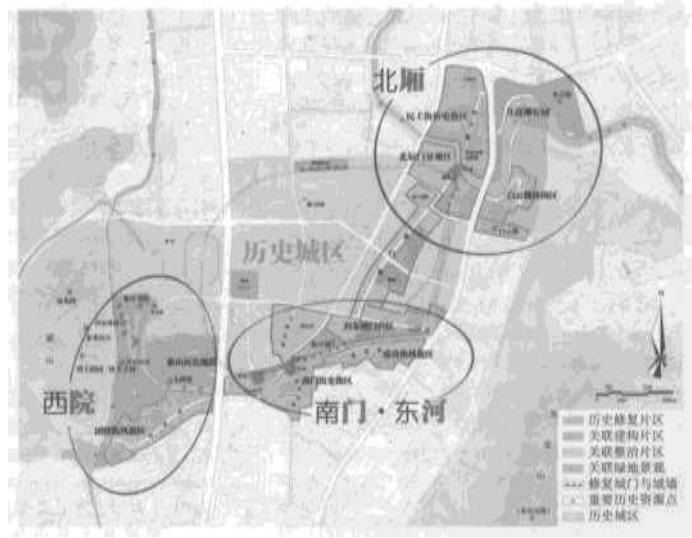


图9 荆门历史城区的意象聚合造“境”图示

资料来源：许广通，2018

## 4 结语

在现代城市环境背景中，历史城区作为一座城市历史文化的存储单元，一方面，由于其格局普遍尚存，依然有作为一座“城”的整体意义与价值特色；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在当前以“遗产本体”为导向的保护语境下，却无法得到充分认识与合理延续。本文将“原型”理论方法引入历史城区的研究，分别从概念原型、存在原型与意象原型的图式关系特征出发，在原型维度探讨“古今关系”“整体关系”与“虚实关系”等问题的统一逻辑，并以荆襄地区历史文化名城为例，探索了具有普适意义的历史城区结构原型辨识方法与保护性建构策略，体现了历史的规定性、演化的规律性与发展的适应性，也为协调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与更新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应对策略。

### 注释：

①荆襄地区的“荆”与“襄”分别指荆州与襄阳，因历史上行政辖区范围变动频繁，故其空间范围广义上覆盖了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省西南部；狭义上则以今天荆州与襄阳市为核心的湖北省中部地区，本文的荆襄地区则重点聚焦于后者——荆州古城与襄阳古城之间的荆襄古道沿线地区。该地区居天下之中、为水陆交通要塞且有群山环列与江汉交汇等天险可借，历史上具有极高的军事与交通地位，为历朝历代的营城重地，但现存城池主要以荆州、襄阳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荆门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代表。

②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 第3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③韩若冰. 明清时期汾阳城城池形态及主要建筑布局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

## 参考文献:

- [1] 常青. 过去的未来: 关于建成遗产问题的批判性认知与实践[J]. 建筑学报, 2018(4): 8~12.
- [2] 常青. 论现代建筑学语境中的建成遗产传承方式——基于原型分析的理论与实践[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7): 667-680.
- [3] 邓巍, 何依, 胡海艳.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以宁波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4): 87-93.
- [4] 何依. 历史城区保护价值的重新认识[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1): 5.
- [5] 《湖北省历代地图成果概览》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历代地图成果概览[M]. 长沙: 湖南地图出版社, 2017.
- [6] 金云峰, 项淑萍. 原型激活历史——风景园林中的历史性空间设计[J]. 中国园林, 2012, 28(2): 53~57.
- [7] 林林. 基于历史城区视角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常态”[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4): 94-101.
- [8] 刘磊. 以原型辨识为导向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策略以豫南新县西河大湾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7(9): 48-54+84.
- [9] 刘炜, 王铭杰, 阮建, 等. 中国古代南北对峙区域城镇防御空间分析——以荆襄地区城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18, 42(4): 65-74.
- [10] 鲁西奇, 马剑. 空间与权力: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J]. 江汉论坛, 2009(4): 81~88.
- [11] 沈克林. 建筑类型学与城市形态学[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 [12] 万谦. 江陵城池与荆州城市防灾防卫体系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 [13] 汪丽君. 建筑类型学[M]. 第三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 [14] 王树声.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湖北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15] 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荆州环古城综合城市设计[R]. 2020.
- [16] 许广通. 历史城区的原型识别与整体建构研究——以荆门历史文化名城为例[D].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 [17] 杨俊宴. 亚洲城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四阶原型与演替机制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2): 18~27.
- [18] 杨正泰. 明代驿站考[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19] [意] 阿尔多·罗西. 城市建筑学[M]. 黄士均,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 [20] [英] 乔治·贝克莱. 人类知识原理[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1]张琳惠. “虽千变与万化, 委一顺以贯之”——拓扑变形作为历史原型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方法[J]. 中国建筑教育, 2016(4):104-115.

[22]张卫, 胡根根. 襄阳古城军事攻防工程空间格局研究[J]. 华中建筑, 2019, 37(11):134-137.

[23]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24]朱文一. 空间·符号·城市: 一种城市设计理论[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